



COLECÇÃO CULTURA DE MACAU

澳门文化丛书

董少新 / 著

PORTUGUESE JESUIT
ANTÓNIO DE GOUVEA AND CHINA

葡萄牙耶稣会士 何大化在中国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CIENCE ACADEMIC PRESS(CHINA)

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COLECÇÃO CULTURA DE MACAU

澳门文化丛书

葡萄牙耶稣会士 何大化在中国

PORTUGUESE JESUIT
ANTÓNIO DE GOUVEA AND CHINA

董少新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在中国 / 董少新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12

(澳门文化丛书)

ISBN 978 - 7 - 5201 - 1168 - 3

I. ①葡… II. ①董… III. ①耶稣会 - 基督教史 - 研究 - 澳门 IV. ①B97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3058 号

· 澳门文化丛书 ·

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在中国

著 者 / 董少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高明秀 王晓卿

责任编辑 / 王晓卿 肖世伟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38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168 - 3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国学大师季羨林曾说：“在中国 5000 多年的历史，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在时间上是明末清初，在地域上就是澳门。”

澳门是我国南方一个弹丸之地，因历史的风云际会，成为明清时期“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的桥头堡，并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互动下，形成独树一帜的文化特色。

从成立伊始，文化局就全力支持与澳门或中外文化交流相关的学术研究，设立学术奖励金制度，广邀中外学者参与，在 400 多年积淀下来的历史滩岸边，披沙拣金，论述澳门文化的底蕴与意义，凸显澳门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2012 年适逢文化局成立 30 周年志庆，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澳门文化局精选学术奖励金的研究成果，特别策划并资助出版“澳门文化丛书”，旨在推介研究澳门与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学术成就，以促进学术界对澳门研究的关注。

期望“澳门文化丛书”的出版，能积跬步而至千里，描绘出澳门文化的无限风光。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谨识

序



我和少新相识是在澳门回归祖国的前夕。研究中葡关系和澳门史的共同学术志趣，让我们在暨南园的葡语课堂相遇，由此开始了我们相互学习、交流的友谊之路。后来，我们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获得东方葡萄牙学会资助赴里斯本大学修读“葡萄牙语言与文化年度课程”。现如今，他已在中西交流史研究的学术领域崭露头角。今有新著《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在中国》（以下简称《何大化在中国》）付梓，邀我写序。我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谈谈读过该书稿后的一些感想吧。

本来，在我们的中葡关系史和澳门史研究中，一直有一个高亢的声音：崇尚和强调专题研究与微观考证。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时代开始推崇鸿篇巨制，呼唤出了一部又一部的皇皇巨著。在此情况下来看少新教授的这本《何大化在中国》，可谓“小人物的传”。然而，学术著作不论大小，质量才是关键。细读这本书稿后，我觉得至少有下列四点值得写出来与读者分享。

客观地说，在中西交流史的研究领域，几乎没有什么选题是前人没有触碰过的，或者说，要真正找到一个有待填补空白的选题已经很困难了。因此，在前人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研究，大体上已成为学术发展的一种常态。在开展自己的研究时，客观陈述和评析前人的相关研究，早已成为史学研究的规范；我们不能既大量引用前人成果，又宣称自己的论著填补了史学界的空白。就这一点而言，《何大化在中国》一书可谓规

范之作。作者肯定了费赖之和荣振华所著两套在华耶稣会士传记资料在提供基本信息方面的贡献，也客观指出了它们太过简略和多有错讹的问题；注意到了葡萄牙学者庞特斯的研究专文，并肯定了它的启发和引领作用。尤其是，作者用较大篇幅详细推介了葡萄牙学者阿劳若的研究成果，指出了他在何大化著作的整理校勘出版方面的贡献，肯定了他在校勘导言和专著章节中对何大化的开创性研究，陈述全面，评价公允。在此基础上确定本书的研究定位：进一步搜集和利用东西方文献，在较为详细考证的基础上，将何大化一生的经历放在明清鼎革之际的中国社会历史脉络之中，通过何大化来看明清鼎革之际的中国历史，以及耶稣会在中国民间社会传教的特点与延续，并试图通过何大化的著作，揭示他在耶稣会中国传教区所扮演的角色。这样的定位是客观的，也是符合事实的。读者细读该书会清晰地感受到，作者通过资料的拓宽，呈现了多处精细考释的亮点，使得何大化研究的总体规模显著扩张，较大程度地丰富了对何大化的认知。

一般而言，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总是首先受到人们的关注，从而投之以较多的精力加以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本身重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历史舞台留给他们的“戏份”也更多些。就明末清初穿梭于东西方的西方传教士而言，沙勿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基于自身条件和历史机遇等因素，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在学术研究中赢得了较高的关注度，吸引了无数的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状态，虽不无局限，却也无可厚非。然而，随着学术的发展，这样的局面必然会改变。以总体史观言之，活跃于东西方的这些传教士，虽然所属修会不同、国籍不同，但在大航海时代的基督教东传和文化交流中，他们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整体。对这个群体加以整体的研究，考察他们之间的共性、差异乃至冲突，当属这一领域的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在这一视域下，需要研究朝廷与地方、中心与边缘、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如此一来，活动于地方、边缘和乡村地区的传教士则也应

纳入研究范围。《何大化在中国》一书所研究的正是这样一位传教士。作者以大量详细的考证向我们揭示，何大化在华传教 47 年，身处明清交替之际的严峻时期，不仅开辟了武昌传教驻地，经营福建教务达 30 年，而且长期活动于地方，面对基层民众，在发展普通教徒和结交地方官员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这些史实当属基督教传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新教授在十年前即选定这样的研究课题，并为之不懈努力，充分体现了他独到的学术眼光。

在中西交流史研究领域，针对来华传教士这个群体，中外学者在研究主题和研究范式上存在相当广泛的同一性。其中，考察和撰写某位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成为最常见的研究套路。在这方面，由于文化背景、语言条件、关注角度等方面的差异，西方汉学界远远走在我们的前面，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要向汉学家学习，包括引用他们整理和披露的文献资料。这是完全合理的，也是必然的。然而我觉得，在对来华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研究中，中国学者还是应该有所不同的，在观察角度上要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何大化在中国》一书将这位来华传教士置于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进程之中，一方面结合中国社会巨变的史实阐述他的活动；另一方面又大量引述和解读他在此大场景中以其所见所闻留下的大批宝贵文献，揭示了这位来华传教士所扮演的独特历史角色：中国改朝换代历史巨变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这正是中国学者应该有的独特视角。他所撰写的八份《耶稣会中国副省年信》、《远方亚洲》和《中国分期史》等著作，不仅成就了他作为耶稣会历史学家的地位，也包含了大量对中国社会现象和重大事件的记录；它们不仅构成了这一特殊时期基督教传华史的重要史料，而且构成了据以深入解读明清历史巨变不可或缺的另类史料：寓华西人的闻见录。深入研读这批文献必将有助于深化对明末清初中国历史变革进程的认识。

文献学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在中西交流史的研究领域，西文资料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应该说，总体而言，西文文献基础薄弱一直是我国学者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在早期中葡关

系史研究中，那些先后高调登场的“发现”和“创新”，终因文献基础脆弱而很快落幕。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把西方学者的成果拿来加上几条中文材料这样的套路，那我们就只能永远跟在西方学者后边，别人写了什么，我们才能写什么。因此，中国学者不仅要做到大面积直接阅读和引用西方文献，还要努力做一些西文资料的搜集研究工作，在文献学上有自己的贡献。《何大化在中国》一书在这方面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并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据我所知，作者自赴葡萄牙修读葡萄牙语言文化课程起就开始致力于搜集和研读诸如《耶稣会年信》《耶稣会士在亚洲系列档案》《远方亚洲》等文献，其中既利用了阿劳若等人的校勘本，也利用不同版本进行了对比考证。正是在长期研读的基础上，作者认识到了何大化这个“平凡”人物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确立并完成了这项难度较大的研究课题。从书中大量的原著引用可以看出，这项研究成果的主体史料（或者说核心论据）来自作者对大量原始文献的直接研读，而非借鉴于西方学者的已有成果。当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要求所有人都这样做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明确地倡导这样的价值取向，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可喜的是，近年来，一批拥有较好外语条件的年轻学者进入了这个研究领域，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不久的将来，中西交流领域的研究水平会有明显提升。

以上所述，只是我对《何大化在中国》一书的一些感想，算不上对整部书稿的评价，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张廷茂

2017年8月3日 于广州暨南羊城苑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东 迈 / 17

第二章 入 华 / 28

第三章 武 昌 / 45

第四章 福 州 / 74

第五章 历 狱 / 135

第六章 著 述 / 164

结 语 / 235

参考文献 / 238

后 记 / 254

绪 论



一 葡萄牙耶稣会士和葡文文献之重要性

明万历年间至清嘉庆中期，在华耶稣会士（包括中国人和土生澳门人）有 900 余人^①，按照法国学者荣振华的统计，其中有 337 位葡萄牙人，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强。在除雍正时期外的其他任何一个时期，来华的葡萄牙耶稣会士人数都较其他欧洲国家的来华耶稣会士人数为多。其他国家在华耶稣会士人数大致为：156 位法国人、133 位中国人（包括澳门人）、109 位意大利人、34 位德国人、33 位比利时人、28 位西班牙人；其他如波希米亚人、波兰人、瑞士人、日本人、奥地利人等，都在 20 人以下。

葡萄牙耶稣会士之所以在数量上独占鳌头，主要是因为葡萄牙自 15 世纪末以来便拥有东方保教权（Padroado）。耶稣会成立以后，其在东方的发展主要依赖于葡萄牙王室的资助，并依靠葡萄牙在东方的诸多殖民、军事和商业据点建成传教网络。在葡萄牙向东扩张过程中，商业利益与传教一直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子不必多举，澳门便是其中的典型。这个被葡萄牙人誉为“上帝圣名之城”的中国南部边陲小镇，不仅是葡萄牙

^① 荣振华所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共计收有 920 人，但是实际人数应超过这一数目，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有个别来华耶稣会士并没有被包括在这 920 人当中。



人经营远东贸易的枢纽，也是耶稣会在马六甲以东发展的“心脏”。为了维护保教权，葡萄牙王室有意向东方多派遣本国的传教士。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葡萄牙耶稣会士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16世纪后半叶开始，葡萄牙在远东的势力受到西班牙的挑战。西班牙不满足于其所拥有的“西方保教权”以及在美洲的殖民扩张，对葡萄牙人在东方经营的香料、丝绸、瓷器等大宗贸易早已垂涎三尺。于是，随着西班牙武力占领马尼拉（1571），主要受西班牙王室资助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传教士在远东与耶稣会士之间的竞争也愈演愈烈，17世纪以后双方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争论，不仅是耶稣会和托钵修会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而且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海上帝国在东方的利益冲突的表现。而到了17世纪下半叶，随着法国对远东利益的介入，葡萄牙的东方保教权受到了更为严峻的冲击与威胁。法国派往中国的耶稣会士虽然与葡萄牙耶稣会士同属一个传教会，但是受法国王室的资助，完全不理睬葡萄牙的干涉。于是来华耶稣会士内部又分裂为两派，法国耶稣会士一派因在科技上的绝对优势而得宠于中国皇帝，成为17世纪末至18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角。

面对西班牙和法国的竞争，葡萄牙不肯善罢甘休，不仅坚守其在澳门的居留权益，而且其对华派遣传教士的数量一直领先于其他国家。此外，葡萄牙耶稣会士一直担任着东方耶稣会内部的主要职位，如耶稣会传教省或副省的会长、巡按使、司库等。例如，1622～1775年耶稣会中国副省的44任会长，大部分都由葡萄牙耶稣会士担任；1568～1771年耶稣会的44任日本、中国巡按使中，葡萄牙耶稣会士也占绝大多数。^① 耶稣会的职务虽然由耶稣会上级任命，但是亦需参考资助者即葡萄牙王室的意见，葡萄牙耶稣会士多在远东担任会内高职，这是葡萄牙维护其远东保教权的又一段。

① 参见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耿昇译，中华书局，1995，第781～792页。

与同属葡萄牙保教权下的意大利、比利时耶稣会士相比,尤其是与后来的法国耶稣会士相比,葡萄牙耶稣会士在科技方面明显处于劣势。但从天主教在华传播史的角度来看,很多葡萄牙耶稣会士仍占有重要的地位,比如贾尼劳(Melchior Carneiro, 1519-1583)、曾德昭(Alvaro de Smedo, 1586-1658)、傅汎际(Francisco Furtado, 1589-1653)、陆若汉(João Rodrigues, 1561-1633)、班安德(André Palmeiro, 1569-1635)、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 1610-1677)、徐日升(Thomas Pereira, 1645-1708)、索德超(José Bernado de Almeida, 1728-1805)、何大化、陈善策(Domingos Pinheiro, 1688-1748)、傅作霖(Félix da Rocha, 1713-1781)、苏霖(Joseph Suarez, 1656-1736)、张舒(Inácio Francisco, 1725-1792)等。据不完全统计,16世纪末至18世纪来华且在华传教时间超过20年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在60人以上(见表0-1)。

表0-1 长期在华传教的重要的葡萄牙耶稣会士

贾尼劳(1543~1568~1583)	罗如望(1566~1598~1623)
李玛诺(1559~1601~1639)	费奇观(1571~1604~1649)
黎宁石(1572~1604~1640)	阳玛诺(1574~1610~1659)
费乐德(1594~1622~1642)	曾德昭(1685~1613~1658)
傅汎际(1585~1621~1653)	伏若望(1590~1624~1638)
费藏裕(1604~1627~1663)	班安德(1569~1628~1635)
瞿西满(1590~1629~1660)	林本笃(1600~1630~1652)
陆若汉(1561~1614~1634)	郭纳爵(1599~1634~1666)
何大化(1592~1636~1677)	安文思(1609~1640~1677)
张玛诺(1621~1651~1677)	成际理(1622~1651~1686)
徐日升(1645~1663~1708)	李西满(1645~1675~1704)
穆若瑟(1646~1680~1718)	奚安当(?~1683~1710)
孟由义(1656~1684~1743)	苏霖(1656~1684~1736)
李国正(1663~1691~1710)	何大经(1662~1691~1724后)
张方济(?~1691~1723后)	林安多(1654~1695~1724后)
金澄(1662~1696~1723后)	李若望(1663~1696~1731后)
高嘉乐(1664~1696~1746)	杨若翰(1672~1696~1731)
毕登庸(1666~1697~1747后)	瞿良士(1667~1697~1724后)
陆玛诺(1673~1697~1724后)	李若瑟(1674~1698~1731)
马安能(1670~1699~1721)	毕多明(1674~1701~1737后)
索玛诺(1677~1703~1732后)	安道义(1671~1704~1741后)
习展(1675~1704~1738后)	张安多(1677~1705~1735)



续表

穆若瑟 (1676 ~ 1705 ~ 1750 后)	魏哥儿 (1681 ~ 1707 ~ 1761)
麦大成 (1676 ~ 1710 ~ 1723)	房日升 (1689 ~ 1716 ~ 1766 后)
罗佩斯 (1690 ~ 1716 ~ 1736)	徐懋德 (1690 ~ 1716 ~ 1743)
斐方济 (1695 ~ 1718 ~ 1761)	秉多 (1690 ~ 1720 ~ 1743)
何云汉 (? ~ 1723? ~ 1744?)	陈善策 (1688 ~ 1726 ~ 1748)
纪类思 (1693 ~ 1726 ~ 1763)	索智能 (1697 ~ 1726 ~ 1757)
安玛尔 (1699 ~ 1727 ~ 1786)	黄安多 (1707 ~ 1727 ~ 1748)
傅作霖 (1713 ~ 1738 ~ 1781)	林德瑶 (1710 ~ 1742 ~ 1785)
穆玛诺 (1720 ~ 1749 ~ 1776 后)	高慎思 (1722 ~ 1751 ~ 1788)
张舒 (1725 ~ 1752 ~ 1792)	毕纳爵 (1724 ~ 1753 ~ 1776 后)
林若瑟 (1725 ~ 1753 ~ 1782 后)	韦斯珂 (1725 ~ 1754 ~ 1776)
索德超 (1728 ~ 1759 ~ 1805)	安国宁 (1729 ~ 1759 ~ 1796)

注：生卒年之间的数字为该耶稣会士来华之年份；表中个别耶稣会士在华时间未超过 20 年，但在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资料来源：据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整理。

这些长期在华传教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大多终老于中国，其中有些在华长达四五十年之久。但是，就目前中国耶稣会史的研究情况而言，对来自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的耶稣会士研究比较深入，一些著名的耶稣会士都有一部或多部专著；^①而对葡萄牙耶稣会士的研究十分不充分，除了贾尼劳^②、徐日升^③、陆若汉^④、安

- ① 截至目前，已出版的各语种《利玛窦传》不下 20 部，汤若望、南怀仁的传记及相关专论也有多种，被誉为“国王的数学家”的法国耶稣会士，其相关文献大都已整理出版，并有专门的传记。学界撰写的部分传教士传记作品，会把该传教士的书信整理收入其中，参见 Nicolas Standaert,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Leiden, Boston & Köln: Brill, 2001), pp. 170-174.
- ② Manuel Teixeira, *Melchior Carneiro, Fundador da 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 de Macau* (Composto e Impresso na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69).
- ③ Luís Filipe Barreto, ed., *Tomás Pereira, S. J. (1646-1708), Life, Work and World* (Lisboa: Centro Científico e Cultural de Macau, 2010); Joseph Sebbes, *O Diário do Padre Tomás Pereira, S. J., os Jesuítas e o Tratado Sino-Russo de Nerchinsk (1689)*, tradução pela Helena Maria Campos Borges da Cunha, e Leite Novais (Macau: CTMCDP, ICM, 1999). 该书原为英文，其中译本为：约瑟夫·塞比斯：《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王立人译，商务印书馆，1973。
- ④ Michael Cooper, *Rodrigues the Interpreter: An Early Jesuit in Japan and China* (New York: Weatherhill, 1973).

文思^①等几人有专门的传记之外，对于其他许多重要的葡萄牙耶稣会士，至今没有专门的研究，比如翻译《名理探》《寰有诠》等著作并曾担任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的傅汎际，长期在清宫效力的索智能（Policarpo Sousa, 1697 - 1757）、张舒等人，我们对其详细情况了解甚少。法国耶稣会历史学家费赖之（Louis Pfister, 1833 - 1891）的《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和荣振华（Joseph Dehergne, 1903 - 1990）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可谓研究中国耶稣会史的最重要参考书，但他们对法国耶稣会士的研究明显比较详细，而对于葡萄牙耶稣会士，很多仅以简短几句带过。

显然，对葡萄牙耶稣会士的研究受到不应有的忽视，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有多种。从中国学界来看，中国学者对明末清初天主教史的研究有着明显的科技史导向，即侧重于对那些在科技上有突出贡献的耶稣会士的研究，而对长期专注于纯粹传教工作的耶稣会士比较忽视。就整体而言，葡萄牙耶稣会士的确在西方科技传华方面表现得不够突出，故不受重视。其实这种以科技传播为研究导向的现象在国际学界普遍存在，研究明末清初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学者，很多都是科学史界的学者。利玛竇（Matteo Ricci, 1552 - 1610）、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 - 1649）、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 - 1666）、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 - 1688）、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 - 1730）等著名传教士之所以成为研究的热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科学技术传播方面的突出贡献。

从葡萄牙的角度来看，19世纪以来，葡萄牙已经从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逐渐沦为一个西欧小国，国势大不如前，因此学界对中葡关系的重视程度远不及中意、中法、中英、中德、中俄等关系。葡语已不再是一种热门语言，无论是中国学界还是西方学界，能够阅读葡文原始文献

① Irene Pih, *Le Père Gabriel de Magalhães, un Jésuite Portuguais en Chine au XVIIe Siècle* (Paris: Fundação Calouste Gulbenkian, Centro Cultural Português, 1979) .

的学者并不多。相比较而言,由于通晓法语、意大利语的学者较多,故在文献利用方面,对法文、意大利文原始文献的使用要比葡文原始文献充分得多。另一方面,葡萄牙学界在汉学研究方面比英、法、美、德、意等国落后许多,葡萄牙学者很少能够阅读和使用中文文献,这导致他们在该领域的研究中不占优势。

就法、意、比、德等国学者的研究而言,他们往往“各自为政”,一般只注重各自国家前往中国的传教士,而对葡萄牙耶稣会士重视不够。例如,法国学者尤其重视对法籍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而比利时学者则更加重视对来自低地国家的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西班牙学者对本国赴华传教士更为重视,对波兰来华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el Boym, 1612-1659)的最好的研究,则出自波兰学者之手。^①斯洛文尼亚耶稣会士刘松龄(Janez Ferdinand Hallerstein, 1669-1736)的传记作者是本国学者斯坦尼斯拉夫·叶茨尼克(Stanislav Juznic)。^②捷克耶稣会士严嘉乐(Karel Slavíček, 1678-1735)的书信是由捷克学者整理、注释出版的。^③专门的学术机构之设,往往也有这样的特点,如比利时有南怀仁研究所,意大利有利玛窦研究所、卫匡国研究中心,美国虽亦有利玛窦研究所之设,但英美学界显然对新教来华传教士更为重视。这一现象是学者自身民族性、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研究基金机构的倾向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有一定道理的。

16~18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尚在形成之中,而目前的研究取向往往是以现在的国际语境来研究300年前的历史状况,无法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历史事实。因为葡萄牙是最早也曾是最强大的殖民帝国,除了开辟和经营东西方贸易外,还拥有东方保教权,所以耶稣会在中国乃至整个

① 爱德华·卡伊丹斯基:《中国的使臣卜弥格》,张振辉译,大象出版社,2001。

② 斯坦尼斯拉夫·叶茨尼克:《刘松龄:旧耶稣会在京最后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周萍萍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作者叶茨尼克为美籍斯洛文尼亚人。

③ 该书信集第一版由约·弗拉什吉尔(Josef Vraštil)收集整理而成,出版于1935年;第二版由高马士(Josef Kolmaš)在第一版基础上增补而成,出版于1994年。中文版见严嘉乐《中国来信(1716~1735)》,丛林、李梅译,大象出版社,2002。

东方的传教与发展，均与葡萄牙王室的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仅就中国而言，葡萄牙是明末至鸦片战争以前唯一一个长期在中国拥有居留权的欧洲国家（西班牙、荷兰曾先后占据台湾，俄罗斯也曾在北京设商馆，英、瑞、法等国在广州也设有贸易商馆，但是时间都远不及葡萄牙人居住澳门时间长）。澳门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环节，而且是耶稣会在远东传教的主要根据地。16~18世纪的中西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中葡关系。

因此，对葡萄牙耶稣会士的研究应该受到重视，否则不可能将那段历史研究透彻。而由于以往学界在这方面未有足够的关注，因此充分利用葡文原始文献研究葡萄牙耶稣会士已成为研究早期中西交往史的一个瓶颈。

记录16~18世纪中西关系史的文献中，葡文文献最多且最重要。由于葡萄牙长期拥有东方保教权，前往东方传教的各国耶稣会士，除了要效忠教宗和耶稣会总长之外，也要效忠于葡萄牙国王。如前所述，来到东方的传教士以葡萄牙人居多，且许多葡萄牙传教士担任东方各教会上层官员；处在葡萄牙保教权庇护之下的传教士在来东方之前，一般要在耶稣会科英布拉学院学习，葡语是他们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有些耶稣会士则要在果阿乃至澳门进一步学习葡语。从16世纪初开始，葡萄牙在好望角以东一直到日本长崎的沿海各地区及岛屿建立了数十个商业和军事据点，由于保教权的存在，这些据点也是各国传教士的根据地。于是，在葡萄牙海外势力最强盛的16世纪及17世纪前期，葡语不仅是各东方商业据点的主要商业语言，而且是在东方流行的主要传教语言。^①基于上述原因，传教东方的各国传教士的书信、报告、编年史、论著、公文、

① 1609年2月15日，利玛窦在北京写信给耶稣会日本、中国巡按使巴范济（Francesco Pasio, 1554-1612）神父，在信末利玛窦对自己用意大利文写此信感到奇怪，“我不知为什么这次竟用意大利文”。参见《利玛窦书信集》（下），罗渔译，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第416页。尽管巴范济也是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士，但在东方传教的欧洲耶稣会士之间的通信一般用葡萄牙文。

账簿等多以葡文写成，从而使这段时期留传至今的中西关系史文献中葡文文献最多，又由于中葡关系是这一时期中西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因此葡文文献也就成为研究这段时期中西关系最为重要的西文文献。

这些葡文原始文献数量庞大，暂时尚无法统计其总量，但估计不少于 100 万件。它们分藏于葡萄牙本土的许多图书馆和档案馆中，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耶稣会档案馆、意大利国家图书馆、梵蒂冈图书馆（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果阿档案馆、澳门中央图书馆和历史档案馆以及西班牙、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巴达维亚、巴西等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也都有数量不等的收藏。^①

研究中西关系史，中文史料当然十分重要。但中文资料的一个特点是很分散，专门的著述相对较少，许多文献中对相关内容的叙述也多只言片语；而且，在许多方面，如传教士在中国下层社会的活动、中葡商业往来等，中文资料显得非常匮乏。而葡文资料相对而言系统得多，大量文献都由馆藏机构做了大致的分类保存，如商业文献、传教文献等，而且已出版许多文献目录，查找和使用起来比较方便。葡文文献的记载也比较全面详细，例如，大量的传教报告、书信或使团记录记载了许多中文文献中看不到的细节。要全面研究这一时期的中西关系乃至东西方关系，如何深入挖掘数量庞大的葡文文献成为关键。这方面的工作不能仅依靠葡萄牙学者，中国学者也应该积极参与其中。当然，葡文文献尤其是其中的教会文献，在使用的时候也需要鉴别与考证，尽可能利用多种文献相互考订，尤其是中葡文献之间进行互证，这样方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相。

① 有关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史的西文原始文献概览，参见 Nicolas Standaert,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 - 1800*, pp. 161 - 237。这部分后由董少新翻译并增补，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西文文献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12，第 269 ~ 339 页。